陈独秀政党思想的演变历程

● 陈彩琴

[摘　要] 陈独秀一生参加和组建不少革命团体与政党。他的政党思想和实践有较长的演变过程，丰富多变。他对民初政党政治进行分析反思，完成从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向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他领导创建共产党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陈独秀；政党思想；民初政党政治

[中图分类号] K251；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4-0024-04

陈独秀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生组建革命团体和政党有十个以上[1]。他的政党思想与实践活动，大致以民初政党政治为界。此前，他组建和参加一些革命团体，形成早期的建党经验和思想。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后，他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领导创建共产党。他的政党思想与实践有长期演变过程，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是中国政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深入探讨。

一、陈独秀早年参加的革命团体和建党思想的萌芽

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可追溯到清朝末期。有学者认为，1903年、1904年他与好友苏曼殊合译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译名《惨世界》），表达他早期的革命观念，其中寓意要组织一个雅各伯党，是他以后成立岳王会的雏形；[2]他后来建党的思想，可追溯于此。[3]不过，本文认为他的革命观念和建党思想还可往前再溯，1903年前他已有参加或组建革命团体的经历。

陈独秀最早的团体组织的经历，可追溯到1901年底在日留学时参加的励志会。该会以“勉励学业、联络感情”为宗旨，但不久他就觉得不合己意退出。此后几年，他根据社会时势的变化，参加或组建以下几个革命团体，在走向民初政党政治的洪流中，贡献出自己的激情和力量。

组建励志学社。1902年3月回国后，陈独秀与何春生、潘赞化、柏文蔚等创设安庆藏书楼，组建励志学社。该学社传播新知，开启民智，鼓吹革命。这是他参加组建最早的革命团体。

组建青年会。1902年9月，陈独秀因藏书楼活动，被通缉，再度赴日。同年冬，他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仿意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意大利”，在日组建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为日本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

组建安徽爱国会。1903年3月，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因革命行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回国后，4月拒俄运动全面爆发，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可称安徽革命的第一声。6月，因清廷诬称爱国会“名曰拒俄，实则革命”，陈独秀遭通缉，亡命上海。在上海与章士钊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与苏曼殊合译的《惨世界》就连载在《国民日日报》上。1904年他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开始传播革命思想，这是以后他创办《新青年》的先声。

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4年秋陈独秀再次到上海，参加由蔡元培、章士钊、蔡锷等人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试制炸药月余。晚年他反思此事时，提到这种消极性质的暗杀活动，“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4]

创建安徽公学和岳王会。1905年初，陈独秀发

起创建安徽公学，并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在安徽爱国公学的基础上，组建岳王会，效忠岳飞精忠报国精神，反对清廷统治和外国侵略。岳王会的影响较大，与华兴会、光复会一样，均是拒俄运动的产物，主要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是安徽当时的革命中心。同盟会成立后，大部分岳王会成员都参加同盟会。但陈独秀没有加入，认为同盟会过分偏重排满，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没有参加同盟会这一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不值得称颂。[5]但是，从此也可看出他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他有自己高远的政治目标。他日后另辟蹊径，从事救亡启蒙、创建共产党、走近托派，走上“永远的反对派”之路,正是这一思想性格的持续表现。

参加亚洲和亲会。1907年春，陈独秀参加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及日本人幸德秋永、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人发起组织的亚洲和亲会，该会宗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去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参加该会体现了他早期的反帝思想。

以上这些陈独秀组织和参加的早期革命团体，虽规模较小，存在时间较短，但体现他早年的建党思想的萌芽。此后，一直到1920年他领导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前，他虽经历热闹的民初政党政治，却没有直接参与政党活动。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关注政治，思考社会，为从事更大的政治运动酝酿更大的力量。

二、陈独秀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

民国初年，各地政党蜂起，安庆有5个政党（有说8个）[6]，陈独秀因不满他们狭隘的资产阶级革命观念等原因，没有参加。但他积极投身当时的革命潮流中，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在安徽地区发挥重要作用。1911年武昌起义后，11月安徽宣布独立，12月他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大力推行改革；并在怀宁创办《安徽船报》，任总编辑，该报是安徽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张革命报纸。1913年7月，陈协助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制定讨袁大计，并起草独立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遭皖督通缉，位革命党第一要人，逃往上海。

随着象征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国会被袁世凯摧毁，辛亥革命失败了，政党政治也随之失败。其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就各政党本身来说，主要是政党之间彼此规模悬殊，随意建立，分合不定，一切党派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没有明确的党纲，党议只是空洞的招牌；政党内部组织涣散，派系纷杂，思想分歧，党员跨党现象严重等复杂原因。因此没有哪个政党能完成保护共和、反对独裁的任务。民初政党政治虽然破产，但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经验。比如，西方政党观念及政党体制渐入人心，有关民主政治的实践，有关政党、政党政治的理论日益丰富。梁启超关于党内自由与集中的论述，黄兴对于党德的重视，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说及对党纲的强调，都为后来提供有益的思索。陈独秀虽没有直接参加组党建党风潮，但对各政党非常了解，也深谙民初政党政治的各种弊端和各种政党理论。这对他政党思想的形成及转变有很大的影响。

陈独秀对当时革命接连失败的政治形势很失望。1914年他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表达自己为革命奔波而不断遭到挫折的苦闷之情，以及希冀探索新道路的爱国思想。1915年他从苦闷中走出，创办《青年杂志》，“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为唯一宗旨”，揭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6年，他发表《一九一六》、《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国会、代议制、共和制、政党等近代政治思想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他开始号召国民参与政治，提高政治能力和常识，认为中国“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采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7]

而中国政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近代政治文明的成果政党政治来解决。起初他否定民初政党政治，提倡国民运动，认为政党政治缺少民众基础，“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关国民根本之进步。预言：“世界政象，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国民政治，亦自一九一六年始”。[8]这种言论很快引起汪叔潜的注意和批判，认为政党政治虽不尽人意，但国事前途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党，而政党在中国还很薄弱，刚刚萌芽，极需青年热心政治，广泛参与，“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何况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并不矛盾，“国民运动之迹不可见，即见之于党派，凡党派之运动，即国民之运动也”。[9]受汪文影响，陈的思想有些转变，但认为政党必须代表国民，否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因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10]。1917年，他发表《民党与政局》，开始全面阐明政党、政党合作、内阁、宪政等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在他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中,他认为政党政治运行有三个基础：第一，民治。他说：“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

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11]第二，独立平等。“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2]因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与君主专制的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可调和的。”[13]第三，舆论自由。他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原。”[14]

他肯定国会在宪政中的作用，批评那种认为国会议员无用的观点，说：“为此言者，盖不知国会之为何物也。国会惟一之责任与作用无他，即代表国民监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动耳；此外固无事业可为，安得以有用无用评判之耶？”[15]创建共产党后，这一思想有变，认为利用现有的旧国会、旧政治体制解决中国问题不现实，解决困难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16]

三、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形成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对军阀混战和列强侵略中国形势的不满，受俄国革命的影响，陈独秀的思想日益激进，急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完成从“国民运动”到“政党改造”的观念转变。[17]他明确提出要组建新政党，开启新革命。“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8]伴随思想的急剧变化，他创建新型政党之路越来越清晰、坚定。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他领导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上海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创办《共产党》月刊，标志一个新政党的出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他再次阐明改造政党的决心。他认为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底产儿”，但“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底希望”，与其疾呼“改造政治”，不如疾呼“改造政党”。“共产党底基础建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19]最终他在吸收借鉴民初政党政治和俄共组织的经验基础上，领导完成创建共产党任务。他在此过程中，形成丰富的鲜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倡导政党要有革命性，要为全社会幸福着想。他认为政党要有远大、纯正的理想，应为全社会的幸福而努力，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20]由此，政党必须具有革命性，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进步。“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21]而判断一个政党是否革命，要以进化的观点分析，以政党的行为来衡量。因为一个党派的理想是静的，社会现象是动的，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是新的、革命的，但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成为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22]

第二，他重视政党的党纲、党章。他说：“凡研究一个党派的内容是什么，必须将他的党纲和党员分子分析一下，才能够明白。”[23]1922年他反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说“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夺权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24]而中国其余的党派“都不过凑合数百个或数十个利害相同的官僚议员，依附军阀来谋一官半职，我们不敢妄说他们是有主义政策的政党”。[25]具体实践中，他领导制定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制定第一部完整的党章。在党外，他先后同无政府主义、南北联省自治等理论进行论战，确保共产党早期鲜明、纯洁、独立的性质。

第三，他强调政党的党纪、宣传和教育。他认为，政党必须有严明的党纪，党员要有服从和牺牲精神，其行为必须对党负责。他分析中国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然要层出不穷”。[26]他说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政党与专政，要保持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挥者不可”。[27]在他的带领下，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设置组织、宣传教育机构和地方各级组织，保障党在组织、思想上不断成熟壮大。

第四，他赞同政党的联合和合作。这是他的一

贯的思想。1917年他在评论中国时局时，认为“各党应平分政权。万不可取独占主义，使对内对外均不能圆滑进行也”。[28]政党要有容忍他党的雅量，尤其当国家处于外患时，要“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之目的”。[29]若党争不休，必引起外国人的干涉。建立共产党后，他的这一思想更加明确。他认为政策不同的各政党，为共同的革命目的可以联合。“我们若是明白了解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30]共产党在与其他政党的联合中，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阶级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31]在联合战线中，共产党在群众面前要时刻显示真实面目，保持自身的独立，“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与联合战线之中。”[32]这种思想也是他领导共产党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驳斥国民党中“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他说：“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能尽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外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乃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惟不若国民党中竟有‘蒋记’、‘唐记’、‘冯记’、‘阎记’之分，则未免可笑。如此主张‘党内无派’，是谓自欺！”[33]他说党派其实是“相对的名词，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说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那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34]

晚年，陈独秀除与中国托派的关系有些复杂外，远离政党活动。1937年他最后一次出狱后，朱家骅曾奉命要他创建一个“新共产党”，他拒绝了；张国焘、谭平山等也先后拉他再组新党，都被拒绝；托洛茨基要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亦遭拒绝。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再组新党。他说：如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社会，一个无产阶级不会有两个党，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要是再组一个党，或者组织不起来，要真地组织起来的话，不会比毛泽东好些。[35]他摆脱党派利益约束，支持并赞同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撰写抗日文章，体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胸怀。

晚年他继续以一个思想者身份，密切关注世界革命形势，继续探讨民主、科学之路，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对苏联革命也有相当的论述。通过对苏联革命经验从局部否定到整体否定的过程，陈独秀晚年在“更高层次上，复归于他早期的民主主义。”[36]

综上所述，观陈独秀一生的政党思想，有较长的演变历程，丰富复杂。但其转变及活跃时期，主要在他带领创建共产党前后的10年间。这10年间，他因袭自身“叛逆”的思想性格，汲取民初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并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完成从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向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转变，开启中国革命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唐宝林，林茂生.前言[A].陈独秀年谱（1879~194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6]沈寂.陈独秀传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296.233

[3]杨天石.苏曼殊、陈独秀译本<惨世界>与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A].哲人与文士[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8-186.

[4]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N].中央日报，1940-3-24.转引自祝彦.晚年陈独秀（1927—194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5]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9.

[7][8][9][10][11][12][13][15][28][2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64.199-200.223.222.203.204.334.408.321.301.

[14][16][18][19][20][21][23][24][25][27][31][32]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1.384.19.388-389.131.298.483.435.468.466.455.489.

[17]严国军.从“国民运动”到“政党改造”——略论五四前后陈独秀政党观念的转变[J].前沿，2011（6）.

[22][26][30]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3.376-377.3.

[33]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29.

[34]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2.

[35]陶希圣.关于独秀的三段事，转引自沈寂.陈独秀传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8.

[36]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平致远